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17 期 (总第 367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1 年 9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转眼就是百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辛亥革命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科学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全盘西化思潮等等纷纷登台演绎，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路。

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际，本刊特此推出专题《辛亥百年》，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辛亥百年

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杨天石：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许倬云：回望辛亥百年，亟待文化革新

汪仲启：百年辛亥：棘手的遗产

●悦读时光

朱镕基讲话实录：

剥夺土地而不安置好农民很危险

●政坛经纬/ 中国新首富梁稳根可能从政 已接受上级人事考察

●人物春秋/ 走进晚年汪东兴

●本期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来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今天，我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实践，审视我国改革所处历史方位，可以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

如何观察辛亥百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从全球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看，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虽说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但总体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同步发展的，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一、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较量、竞争与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来，前五十年风云激荡，战争、革命、危机、冲突不断。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经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 年从美国开始的）。二次大战后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东西方阵营，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后来的南非）独立，对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知识化，出现知识经济、智能革命浪潮，中国正赶上这一波发展浪潮，取得巨大后发优势。从 2008 年开始又引发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至今世界经济未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辛亥百年来，我们看到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变化：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思想文化上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组成集团，冷战对峙。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计划经济动员全社会财富，实现快速赶超粗放型工业化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后来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核技术利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这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威望，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终于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像抛物线那样先高后低，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2、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但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纳粹虽然灭亡，但纳粹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时有火星冒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对此保持持续不断的警惕。

3、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提倡罢工自由，节制资本盘剥，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发展着，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

4、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反对垄断；政治上坚持宪政自由和议会民主，推行社会改革，调整分配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缓和社会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

步；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变革无疑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中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基本制度对资本节制不力，甚至有意纵容，使得美国的金融大鳄有可能吞噬其他国家的金融财富；虚拟经济有可能吞噬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引发规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带来社会动荡；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也可能最终因其在一定时期内无力偿债而导致国家信誉的崩溃，也会拖累其他国家。

5、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型经济和快速赶超的粗放型工业化。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上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实行思想文化舆论统制；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我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对这种中国发展模式，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因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同时，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许多清醒人士已经看到，这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曲折与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企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道路走向宪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毕生奋斗，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走向共和。建国 60 年来，前 30 年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照搬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严重失误。经济上全面国有化，追求一大二公，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比前苏联更急于快速赶超粗放型的工业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取消了社会私权领域。文化上推行斗争哲学、驯服工具，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这样，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我们党成立时走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门，想不到建国后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国家经济遭巨大损失，政治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仅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间就平反了 300 多万人），社会信仰造成混乱，国民心理遭受巨大创伤。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经由这一历史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三，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 以年平均 9.7% 速度持续 30 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 总值由 1978 年 3600 多亿元猛增到 2010 年的 39.7983 万亿元(约 5.74 万亿美元)，翻了 110 倍，人均达到 4283 美元。我国 GDP 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 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 4000 美元的目标，2010 年已经达到，提前了 40 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 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 1364 万辆，增长 46.2%。2010 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 1800 万辆（生产 1826 万辆，销售 1806 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 2009 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 800 万桶，美国是 2000 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 年中国钢产量达到 41750 万吨，超过美英等 28 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 13350 万吨，英国加欧盟 25 国产钢 19890 万吨，他们加起来才 33240 万吨。想一想 1958 年我们为 1070 万吨钢，动员了 9000 万人土法炼钢，炼出 400 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30 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30 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 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 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 GDP 的提高，随着 30 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 0.28 上升到目前的 0.48（欧洲与日本在 0.24~0.36 左右）。而且，1% 的人口掌握了 41.4% 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 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到 2009 年底达 32 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 9 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 0.2 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 20 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 18 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 128 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 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 SARS 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 GDP 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一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 16 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 900 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 20 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 贪官有情妇，60% 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 146 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 17 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在 16~18 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 95 本，制作性爱标本 236 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 200 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 40 来人，新加坡独立 45 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悖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

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闾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我们从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与中国的实践来看，还可以得出这么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

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邓小平在 1980 年和 1986 年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政改的路还很漫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图为一居民小区。

四，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 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到 2004 年，用了大约 25 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 15 年到 20 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 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

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欧美国家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当中也出现过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出现了产业与资本财团的寡头垄断，出现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普遍腐败，社会失业工人很多，贫富差距拉大，妓女满街走，社会治安一片混乱。20 世纪初，美国在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领导和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反垄断的斗争，美国媒体发动了充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扒粪运动”，引起全社会震动。由此推动了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台。顶住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教育普及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失业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支持工会与资方展开利益博弈，从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场成功的改良运动，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出困境。这是列宁当年写《帝国主义论》所未曾料想到的，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其结论也被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摒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在制度层面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这是中央一再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内容方式，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中国现在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寄托谋生前途于大学学历与文凭，将谋生与做学问混淆起来，结果毕业生往往缺乏做人做事的学问，扼杀了各行各业的创造力和生机。信息时代，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电视、手机、广播，广开门路，制作各种课程，从生存技能到生活艺术，从广博的知识到专业的学问，都可以任人选择学习。职业门槛应以职业技术资格为基本，重点在于实际贡献。全社会应鼓励人格平等、职业地位平等，靠合法劳动谋生光荣的风气。职业教育与做学问分开，也是教育改革必由之路。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1993年，邓小平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今天回头看，小平同志的预见多么正确！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目前我国医疗的现状，是所有病患都诉诸于大医院和专科医院，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结果是病人和医生都不满意。如果改为社区医疗为基本，大量培养社区全科医生，在社区做保健诊断与保健指导（中医讲究“上医治未病”），有了小疾病就地解决，就会大比例降低患病率和医疗成本。社区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由社区医生介绍到专科医院、大型医院，这样就理顺了医疗体制。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上海这些年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新到任时，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

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的确，现在不少城市是表面繁荣，百姓痛处何在，缺少关心。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不安全屡见不鲜，药品有假冒伪劣，还有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震惊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达到19.0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还有一组数字，据财政部谢旭人部长介绍，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项开支总共6000亿元，相当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国，同样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相当与政府总开支的61%，为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18%，中国5.1万亿占到20%，说明中国政府相对收入高于美国，但美国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拨款？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中国党政官员多，三公消费开支大。要坚持以人为本，实施民生财政，抑制三公消费，新的财税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级。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0%~60%以上（目前我国为46%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56%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级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有专家提出，我们如果能培养出7000万高级技工队伍，就能解决这中产阶级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

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级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级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问题。欧洲、日本、美国的城镇化，是保护农民本有的土地和生产生活方式，帮助农民做好医疗服务、生产服务，在村镇的生活便利与美观艺术设计上，在宗教文化艺术精神生活上，在环境保护和行业自律上，给予良好的设计与保护。而不是搞乡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消费城市化，环境污染化。而我国有些地方的城镇化，大批农民被改变生存基础与生活方式之后，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往往成为矛盾焦点，粮食安全问题也存在较大风险。大批农民作为城镇化居民，会要求与城里人平等待遇，如果得不到满足容易成为乱源。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在不可预知的危机到来时，社会便会显示出强韧的弹性，社会结构就会更加牢固。所以，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统计，每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而我们国家有 13 亿人口，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45 万个，备案的社会组织 25 万个，实际存在 300 万个左右，即使如此也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但这些社会组织已覆盖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初步形成体系。仅 6 万多个行业协会就联系企业会员 2000 多万，4 万多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 500 多万人，专业协会联系 1000 多万家。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目前对社会组织还是制约大于鼓励，重要法律法规并不完备。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

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制度，来确保社会改革成果。当前急需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建立这个制度要配合建立信息获取机制——保证公众知情权，即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的权利，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在第一时间就能保护自身权益；利益凝聚机制——以一定组织形式为载体，把公众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炼起来，达到提供政府决策的层次；诉求表达机制——让公众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环节，如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表达机会。还要设置相关制度使利益各方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施加压力机制——当今利益分化，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资源多，为自己争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必须有特殊的施加压力机制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对这种施加压力机制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规范；利益协商机制——在利益诉求明确基础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进行对话与谈判，协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决利益纠纷，政府无需事事介入，既减行政，又节约社会成本。目前急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在矛盾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第三方的调解和仲裁必不可少，应该鼓励成立民间仲裁机构，大量的纠纷应该交给民间仲裁机构处理。中国古代民间纠纷，一般是族长或乡里有德行威望的人给予仲裁（做主），其次是找里正，再次才是告到衙门。民间仲裁无法解决，才由政府 and 司法机构介入，担任最后仲裁角色，这是矛盾终止机制，类似于法院的终审裁定一样。

五，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而谨慎地推进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

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 25 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

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应该是 21 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改革 30 年多来，我们丧失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机会。但 30 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就，即党与国家领导人形成年龄、届别的定期规范的交接班制度；网络媒体日益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平台，这些成就意义重大，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即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必定会迎来新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经过“三步走”改革路线图，到建党 100 周年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社会体制改革也接近完成。到新中国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任务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中国模式”也可以光耀世界了。（作者周瑞金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杨天石：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这样的论证。似乎这种说法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与之不完全相同。第一，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二，这一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它只面对专制制度一个敌人，但是，当它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站起一个新的反对者，这就是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的革命者有鉴于此，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政府实行的“新政”。

关于此点，读者只须比较“新政”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多项法令，就不难明白。当然，他们的某些政策，例如，实行“平均地权”，征收单一的地价税，免除其他税种，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却视之为消灭贫富差别、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觉得，如果就这次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动员口号来说，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但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因此，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关于这次革命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并不能为这种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热衷的只是收回利权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两个阶层，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也讲不出其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着他们政治主张的分野。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他们只支持一种政治主张，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道路。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 19 世纪末年至 20 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至 1905 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 1910 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过科举以谋进身之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里，既增加了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增加了西方 17 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混”进军队的职业军官和职业士兵，有的则“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脑力劳动者，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当记者、教师、文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划分阶级的。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根据什么来为他们划阶级呢？能根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吗？须知，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会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呢！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迹者之终无成耶！”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版，第 288-289 页）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文章曾大骂资产阶级是“掠夺盗贼”（《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 2 期），后来孙中山也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参见拙作《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哲人与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4 页）。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孙中山生前，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孙文力助工人之宣言》，《香港华字日报》，1921 年 6 月 9 日）。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时，曾经分析过俄国先后出现过的“三代人物”，第一代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为代表的“平民

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页）可见，列宁不曾认为“非无即资”，政治舞台上除了这两大阶级外，还有其他阶级或阶层。

毛泽东在分析五四运动时也曾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0页）。他并没有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至今似乎也没有史学家或其他人对此做过判断。那么，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论定早于“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呢？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中，梁启超主张实行“制限选举”，反对给家无足够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他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和政府，那么，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革命派与此相反，主张实行没有任何财产和文化限制的“普通选举”。反问说，何以家无足够储粮，就没有资格成为议员，“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61页）在资本问题上，梁启超歌颂资产阶级是“国民经济之中坚”，认为中国应该“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为了与外资竞争，应该有大资本家，有托拉斯垄断集团。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只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财富分配问题，避免出现欧美社会贫富悬绝，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

姑不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这些争辩的是非曲直，但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等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党人则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考虑到当时的革命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因此，我以为称这批革命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本文节选自作者为《帝制的终结——插图本简明辛亥革命史》一书所撰写的前言，岳麓书社2010年4月出版）

许倬云：回望辛亥百年，亟待文化革新

许倬云：历史学家，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

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

采访人：陈书娣

被称为中国台湾历史学界耆宿的许倬云，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凤凰网找到正在美国讲学的他，在与凤凰网探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提出要“整理一套自己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系统理论。”

他说，儒家文化与皇朝实力、清末变法的崩溃是辛亥革命的大背景，“辛亥革命只是一颗大树在完全蛀空的时候，风吹草动都会将大树吹倒。”

关于孙中山，许倬云说，孙中山“无论在文化上，或是社会上，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离精英和核心都很遥远”。也因此，“孙中山先生没有任何包袱，可以提出革命的理论，而且一生不断的修改自己的革命理论。”

但是，许倬云认为三民主义中忽视了农村的重要性，生于江苏无锡长于台湾学于美国的许倬云，自然而然地拿台湾农业来举例，他说，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农村正在被工业占有，“海峡两岸都有都市过度发展的臃肿病，也都逐渐呈现农业用地的不足，最后会导致粮食的不足，在全世界都粮食不够的时候，中国人到何处买粮？”

许倬云由辛亥革命本身引申到了对现代农业以及文化的回归思考。他说，在多元的变化世界中，过去坚持的一些价值观今天已经逐渐衰微，“我们必须依靠以”人类“和”人“本身，作为建构起点的普世价值观念。”关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许倬云与历史学家章开沅有着共同理念，他说，“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是以人的‘心’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我们已经经过了两次政治革命，但是，文化的革新，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承担的重要任务。”，最后，许倬云强调说，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辛亥革命大背景是清朝被蛀空、变法不畅

我们必须先考虑到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这么一场大革命的背景，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也同样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也终结了教会神学的独占文化，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是在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应付兴起的社会经济，宗教革命也已经将神学的独霸切断了。

回顾中国几千年发展，儒家文化从汉代发展到相当完整的地步，一路走来也吸收了佛教和中亚一些其他宗教的因素，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也影响到中国人几千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到了宋代，理学出现，订下了一套相当固定的规格，再加上儒家知识份子被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影响，和皇权的庇护，结合为一个互相依靠的共同体，中国几千年

来的儒家文化系统，实际是走向了僵化。明代晚期，阳明之学兴起，要回到个人自己的心性，争回个人的自主权，但是，清代的考证之学，又将义理的探讨搁在一边，儒学终究失去了活力。

另一方面，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的统治结构，有主奴之分，莫此为甚。清代的统治机构，在康熙时代，国土极度扩张，也极度的消耗了满清的实力。乾隆号称极盛，实际上是强弩之末。文官制度，也已经败坏。中国的经济，在明代曾经因为大洋航道的开通，吸纳了大量新大陆的财富，但是，经过清代的大量耗费，而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长期出口的顺差已经转成逆差。因此，清代国力，到嘉道以后不断的走下坡路，经不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失败。无论从文化的活力和皇朝的实力，中国都已经走到疲惫衰退的情况，已经躲不开最后的崩溃。清朝像一颗大树，完全被蛀空了，辛亥革命的风吹草动就将这颗大树吹倒了。

清末的变法，一直走不顺畅，起头是不愿变，后来是打了折扣的变，最后只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变，从头到尾，没有人讨论过中国种种特殊的情况，该如何的变。从满清本身的统治阶层和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化精英，我们都看不见有能够真正规划变法，贯彻君主立宪的领导者。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以及八国联军以后东南督抚，都拘于儒家的君臣名分，都不敢出头敦促朝廷变法。以致于最后，武昌城内的新军，仓促起义，竟终结了几千年的皇权。

孙中山在革命中有独特地位

孙中山先生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确实有其独特的地位。无论在文化上，或是社会上，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离精英和核心都很遥远。也因此，孙中山先生没有任何包袱，可以提出革命的理论，而且一生不断的修改自己的革命理论。

他最初是简单的种族革命，驱逐鞑虏，后来又加上“平均地权”，加上一些经济革命的诉求。他想动员的会党力量，其实是华南沿海以农村为基地，延伸了海外华侨社区的民间组织。十次革命，都只是在沿海小地方，做一些小规模尝试。如果一直这么做，这些微弱的力量撼动不了满清的皇朝。

武昌起义的新军，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渗透，而武汉又是长江中游枢纽之地，才能一举成功。长江流域的会党，是以城市和交通路线上的“底”“边”群众作为基础的团体，华兴会的群众性格和华南和海外的洪门相比，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

1930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接续辛亥革命后续动作

辛亥以后，东南各省立刻响应，带头的都是各省刚成立的议会领袖，这些人其实就是东南各地的地方士绅，东南沿海的城市文化对他们已有重大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也已经逐渐转移到城市之中.可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军事力量，而且他们一直寄望于立宪，在革命的阵容中，他们至多只是配角而已。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权，是以武装力量维护了前朝的既得利益阶层，从清朝晚年的捐官之风，和“官督商办”的制度，许多旧日社会上层掌握的资源，转变成新的政治权力和财富，在皇朝的废墟上，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基本上只在缓慢的走向现代。要等到 1930 年以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兴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的主导阶层，中国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断的辩论中国该走的方向和发展的模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理论，都是大家讨论的课题。这一段时候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

南京政府完全忽视农村特色与需求

从有了新兴的城市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也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推动现代经济，逐渐组合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偏安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三民主义”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加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民族主义的坚持，合为一体，又配上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考试，与谏官制度的监察权，作为新政权的结构理论。

在南京中央政府，是依仗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经济为基础的政权。这一个政府，最严重的缺陷，是以西方的模式，完全忽略农村的特色和需求。因此，那十年的工作，农村是抛在后面，统治者疏离了农村，农村的建设极为有限，城乡的距离几乎一面倒的疏远。

1949 是 1911 的承继及辩证发展

八年抗战，中国民穷财尽，疲惫不堪，再加上五年内战，战时毁损的城市文化，重创之余，终于被游击战之中茁壮的农村文化打败了。

1949 年以后，中国进入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由将近三十年，是以农村文化为主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

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 年和 1949 年两次革命，是一种辩证式的历史发展，正反合的三段论，是不是能在最后提升？确实要看目前和往后二三十年的变化，也看我们自己的努力。我盼望 1949 年和 1911 年不是断裂，而是延续，即使是摆动的延续，也要在摆动中获得经验，吸取教训，寻求一步步的提升。

辛亥革命在三地有不同的意义

至于说到辛亥革命在两岸不同的解释，在大陆，辛亥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孙中山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在台湾，国民政府是南京时代的延续，辛亥的开国，在台湾的观点看，并没有终结，孙中山的理想，还有待实现。辛亥革命在台湾本身的历史上，又是一个不同的意义。1911年，台湾已经属于日本，然而在台湾的有志之士，故国的革命对于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还是重大的事件。

1949年到今天，台湾的发展也已经有60年了，“三民主义”的理想还并没有在台湾实现。在中国分裂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怎么办？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台湾的社会福利政策，还离理想很远。在族群冲突的僵局下，民权主义躲不开民粹的干扰，常常沦为争权夺利的闹剧。不过，台湾的城乡距离确实已经缩短，台湾全岛几乎是一个大的都会区；可是，农村终究还是吃了亏。

在大陆，三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又一次，城市在吞灭农村，现在农村的劳力一批批的流入城市，农村的土地一块块的被工业占有，农村也在消失中。台湾和大陆两个发展的例证，看来都没有城乡正反的合，而是牺牲了农村的一面倒。海峡两岸都有都市过度发展的臃肿病，也都逐渐呈现农业用地的不足，最后会导致粮食的不足，在全世界都粮食不够的时候，中国人再到何处买粮？当全国都是水泥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吸的绿色空间在哪里？

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前面说过，满清晚年，中国文化已经进入僵化状态，这一弊病使得最近一百年的中国人，只知道模仿：模仿日本，模仿欧洲，模仿美国，模仿苏联……最近三十年来确实中国经济有极大的进步，可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工业和建设有多少是自己的创新？

我们种种政策有多少是针对实际的情况，认真的设计，而不是学这个学那个？今天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也不知道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大家只是一天天过日子，能赚钱就好。长此以往，我们不就回到原始野蛮人的境界了吗？辛亥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五四以后对新文化的向往，一直是摸摸索索，以模仿为主，而不自己用心。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同样的危机，西方文化从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以后，建构的现代文明，正在逐渐衰败，其主要的问题也是在多元的和变化的世界，过去坚持的一些价值观念，今天已经逐渐衰微。正在到临的科技文明和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依靠以“人类”和“人”本身，作为建构起点的普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是以人的“心”“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我们已经经过了两次政治革命，但是，文化的革新，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汪仲启：百年辛亥：棘手的遗产

100年来，辛亥革命从未被忘却，甚至从来未被真正接受。

中国接触现代世界，始于1840年来自英国军舰的那声炮响。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那声枪响才是中国人真正奋起，主动迎接新世界的标志，它划破了古老帝国2000余年密不透风的皇权专制铁幕，真正在亚洲最大的国家开启了追求民主共和的历程，其伟大意义，堪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相提并论。然而，惋惜、质疑，甚至责难也一直伴随着它。日前，《社会科学报》社与九三学社中央《民主与科学》杂志社在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理论研讨会”。研讨会共吸引了来自民盟、民进、民革、九三学社等多个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来自两岸（大陆、台湾）三地（京、沪、台）的专家学者共计50余人到会。与会人士就辛亥革命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探讨，“革命是否成功”、“革命与改革的关系”、“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辛亥革命与两岸统一”等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革命打断了立宪的进程？

如果不是那一声枪响，打断了清廷的立宪之路，中国也向日本、英国一样走向宪政共和，那该多好啊！孙中山先生亲口承认，“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辛亥革命成功了吗？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表示，辛亥革命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它做出了很不一致的评价。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历史学家邵鸿表示，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评价较低，说其未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现在很多人又对清廷立宪的改革因素，非暴力因素和地方社会和平过渡的因素，给予很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时代。民主共和的潮流一旦涌起，任何人想走回头路都不可能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也认为，辛亥革命今年的讨论，有很复杂的思潮背景，“一是高度称赞君主立宪，甚至埋怨辛亥革命，称中国如果不是革命，也可能像日本英国一样，通过君主立宪更早走向民主共和。二是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说孙中山是汉奸，他原来驱除鞑虏，后来又提倡共和，出卖了汉室。”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人们在评价近代革命的时候，都说英国革命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好，中国革命更差，因为太过激烈。有的说革命不如反革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立宪派，立宪派不如老佛爷，老佛爷都已经开始准备立宪了，你们这不是捣乱吗？没准人家已经搞上去了。“这都是一种回溯性反差。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能如果，也不能假如，更不能回溯，既然已经发生了，必须承认它，无数先烈选择了这条革命的

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全喜表示，很多人只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暴力因素，但清帝逊位，不是将王权交给一家一姓，而是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是一种和平的“禅让制”。“中华民国”是革命派、北洋和清王室共同妥协又合力的产物，这就是留给今天最好的精神遗产。

在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中，改革输了

20世纪两个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均进行改革，印度进行宪政改革后，革命没有发生，改革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中国的清末改革则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有人据此反对改革，称如果改革，会动荡，会催化革命。北大历史学教授岳庆平说，从历史看待革命与改革，一定不能狭隘地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正面吸取教训，要从革命推动改革的角度来看，不能停止改革步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也扬认为，大量历史材料说明，提出改革时间表并未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一下子鼓舞了全国人民，人们重新喊出了“大清万岁”这样的口号。“我认为，走向革命主要是因为清廷对待改革没有诚意，有犹豫、摇摆、倒退，使得在宣布改革时间表时赢回的民心又渐渐的丧失了，导致最后革命跑到了前面。”

雷颐先生曾经提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王也扬表示，历史出现了某些惊人的相似，有学者概括现在中国又出现了革命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我们虽然崇拜革命，歌颂革命，但是我们崇拜和歌颂的是过去的革命，唱红歌就是歌颂过去的革命，而现在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今天避免革命跑到改革的前面去呢？”张木生说，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只有进一步改革，才能告别革命。

邵鸿表示，辛亥革命中提出来“三民主义”作为民族的奋斗目标，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民族独立得以实现，民生问题有较大成就，现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任务是发展民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在一百年后回顾这一伟大运动时对自己的鞭策。”

反思革命的意义在于镜鉴今天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长许耀桐说，现在学界对英法革命评价较高，而对中俄革命评价较低，革命后中俄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辛亥革命的意义可言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媲美，革命为后来的改革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刘志琴表示，应重申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3000的历史巨变，建立中华民国，不可抹杀这个历史。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分权的夏商周朝都有超过600年的生命，而秦以来集权的王朝，都不超过300年，可见分权的王朝寿命更长。反思历史的意义在于镜鉴今天，这提示我们未来改革的思路——分权，“分权最好的办法是民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说，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睡狮”，一睡睡了数千年，孙中山他们醒来了，因此无论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都不为过。今天我们也几乎有一种要“睡着”的感觉。为什么西方国家不会睡着？因为他们每4年或8年就要来一次民主活动——选举，有民主，想睡都睡不着，没有民主，这个国家一定要睡过去。

张木生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民批判的时代，也是一个掀起狂澜的时代，我们还碰到了这么大国际和国内问题，因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超越左右的冷静思考，“能够在平静的争论中给我们下一个时代一个振动最小的、非革命式的运动。”中国科协研究中心原主任袁正光也认为，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的序幕，尽管一百年来遇到了很多波折，但新文化还将继续，科学与人文还在进步。

辛亥革命是两岸统一的精神脉源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大变革是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那么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的三大期待应该是两岸统一、中国走向海洋以及制度人心文化思维的大提升。台湾著名作家与政治评论家郑浪平说，这三大期待的实现都离不开台湾回归，而辛亥革命是两岸走向统一最重要的心理认同枢纽。一定要承认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岸才能在辛亥革命这一点上找到共同出发点。但是100年来，特别是1949年来，分裂的祖国大陆和宝岛台湾当局都未曾正视过这段双方共同拥有的宝贵政治遗产和精神脉源。刘志琴也表示，建立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不能把中华民国忽视掉，“中华民国领导了30年代的经济建设，领导了抗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台湾著名政治家、立法院前立法委员、新党党魁谢启大说，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两岸仍然抱着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对方一同举办纪念活动。从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它在两岸都从未被真正的纪念。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一起时，“一个中国”是成立的，当其中一个真的变成了台湾，中国离统一就越来越远了。因此，两岸渴求统一的人，必须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遗产。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刘序盾表示，辛亥百年纪念是凝结两岸共识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清楚的意识到辛亥革命时的理想目标哪些实现了，哪些还未实现，哪些至今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代中国，还在拖中国社会进步的后腿。

如何面对这份棘手的遗产？争论还将继续，中华民族也将在争论中逐渐清醒。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不可能再来一次，这预设了所有罪行和过失必将得到宽容，以致忘却。历史同样如此。纵使后人假设再多的可能性，历史终究不能从头来过。也正因如此，历史的激荡、回

旋、摩擦、分裂，以至杀戮流血，最终都不得被接受，并得到宽容。但人类，恰恰从不满足于仅仅接受历史，因为，历史的意义从未定格在过去，而是永远向着未来。（作者为社会科学报编辑、记者）

●悦读时光

朱镕基讲话实录：剥夺土地而不安置好农民很危险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9月8日起，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同志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实录》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昨日，湖南省图书城最新图书展示柜前围了不少读者，他们正翻阅《朱镕基讲话实录》。湖南图书城销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此书上架200套，到下午4点前，已销售40多套。购买者以中年人、白领人士居多。购书现场，中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看过《朱镕基答记者问》觉得非常过瘾，这本新书应该算是续集。”

据新华社、本报记者曾鹏辉报道

“很多民间疾苦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原标题是《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编入《实录》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五条要求】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朱镕基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约法三章】

“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就任讲话

[朱镕基语录]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2001年6月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讲中说。

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2002年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卸任总结

“绝大多数同志，还没意识到房地产过热的严重性”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 480-489 页，原标题是《值得纪念的五年》。2003 年 1 月 27 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 50 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 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得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2011 年 09 月 09 日来源：潇湘晨报）

中国新首富梁稳根可能从政 已接受上级人事考察

核心提示

不久之后，梁稳根有望完成他人生的华丽跨越。

9月18日，来自湖南省委组织部和长沙市宣传部门的官员证实：上级已于近日完成了对57岁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

对此消息，记者曾于9月19日分别向梁稳根和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进行了当面求证，均得到正面回应。9月20日，记者深入湖南涟源大山深处梁稳根的老家，试图还原这位中国新首富的成长发迹之路。

[求证]

华丽跨越几无悬念

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特地停顿了一下，看定梁稳根说：“我们也祝愿梁总登上新的高峰！”

9月19日，长沙气温骤降。

当日下午4时许，梁稳根陪同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等领导步入“三一重工世界最长臂架泵车下线新闻发布会”现场。梁身穿深蓝西服和浅色衬衣，戴一副无框金丝边眼镜，未打领带，看起来轻松而干练。

入座前，记者首先对其“已顺利接受人事考察”向梁表示恭喜。

为进一步核实该消息的准确性，记者又采访了三一集团的二号人物总裁唐修国。唐对此予以了正面回应，他说：“你们应该祝贺梁总，来考察的是梁总，不是我。”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面对记者“长沙市怎么看待这次对梁稳根的考察”的提问，参会的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婉转作答：“关于三一集团梁总身份的转变，现在还处在考察阶段，你们最好再找党务部门作进一步了解。”

记者注意到，会场的座次和名签安排有些微妙变化。

在第一排座位的排序中，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坐中间，往右依次是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按惯例，一般而言，梁稳根应坐于张剑飞的右侧。

此外，包括记者在内的与会者都注意到一个特别细节，当于来山在最后发言快结束时，特地停顿了一下，看定梁稳根说：“我们也祝愿梁总登上新的高峰！”

[探究]

民企掌舵人的上升路

据了解，梁稳根能成为高层部门的考察对象，除了他在三一集团的巨大贡献外，也与其做人低调和他本人体现出的从政禀赋有关

事实上，梁稳根即将获得的华丽跨越，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和荣誉的一次简单提升，更代表了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地位之变。

业内观察人士评价，尽管早在多年前青岛海尔 CEO 张瑞敏、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等企业家也曾先后进入中央高层序列，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这些企业均是国企或央企。而作为拥有个人财富超过 350 亿的下海民营企业家，此次若能顺利晋升，梁稳根应是中国民企第一人。

学界人士认为，此举象征意义更大于政治意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说：“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既表明执政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所在阶层的利益表达。”他认为，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民营企业家时常被看做是“资本家”，长期以来被拒执政党的权力中心之外。尽管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普遍却仍不高。

因此，梁稳根的晋升机遇，意义非凡。

据了解，梁稳根能成为高层部门的考察对象，除了他在三一集团的巨大贡献外，也与其做人低调和他本人体现出的从政禀赋有关。

[出身]

走出山沟的“篾老四”

恢复高考时，他考取了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的金属材料系，1983 年毕业后进入兵器工业部，1986 年下海创办企业，直至今日成为中国新首富

出身寒微的梁稳根，父祖辈均是篾匠，他也干过多年篾匠，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称“篾老四”。

“这个‘篾老四’就会两门手艺，一个是编筲箕箩筐，一个就是做工程机械。”9 月 20 日，梁稳根的发小玩伴梁永和这样向记者评价他眼中的梁稳根。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山村道童村，地处湘西雪峰山余脉的山脚下，属湖南涟源市茅塘镇所辖，梁稳根的祖籍就是这里。多年来，隐没于山坳间的几百农户一直以种植稻、麦、薯类和外出打工为主要生计。

记者看到，该村最恢弘的建筑物就是梁稳根的老宅，两层小洋楼，地势很高，白色墙体、水红色琉璃瓦，楼房前是一个 250 平方米的院落，种满了名贵花草藤萝，院门两侧蹲着两个汉白玉底座的狮子，门楣上的春联已经泛白。

据梁永和介绍，梁稳根家当初是道童村最穷的，甚至连住的土墙屋都不是自己的，“甚至快到了要饭的地步”。

梁稳根人生最大的转机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恢复高考时，他考取了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的金属材料系，1983 年毕业后进入兵器工业部，1986 年下海创办三一重工企业，直至今天成为中国新首富。

71 岁的村民梁永大透露，梁稳根原名是按宗族派系“永”字派别起的，实为“梁永根”。1988 年，梁特地将“永”改为“稳”，知情者说，其中有两层涵义，一为事业稳定，二为做人稳重。

[行事]

私人飞机的高调与低调

梁稳根除了富贵逼人外，在捐赠善款时也是一掷千金。据不完全统计，梁稳根为涟源和茅塘镇合计捐赠已超过 6000 万

由梁稳根掌舵的三一集团旗下共有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和三一国际。当前，梁稳根持有三一集团 58% 的股权，持有三一重工 168658 万股，三一国际 120350 万股，仅以今年 9 月 20 日收盘价格计算，梁稳根的身家高达 335 亿元人民币。

眼下，梁稳根不仅拥有 720 万元的豪华座驾迈巴赫 62 汽车，而且在祖籍道童村里还有一个私人停机坪，经常停在上面的，是价值数千万的私人飞机。

直升飞机停机坪是梁稳根在老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更是他的财富标志。

位于梁家祖籍正门前如篮球场大小的直升飞机停机坪，呈规则圆形，原为一个池塘，为开凿隧道的工程高标水泥浇筑而成，半径 20 米左右，比标准的篮球场略小。57 岁的村民肖阳红告诉记者，每逢清明和春节，梁稳根回老家祭祖时，都会自驾直升飞机在此地降落，“他每次从飞机上下来，都会向围观的村民们招手问好，他总是很和气”。

梁稳根除了富贵逼人外，在捐赠善款时也是一掷千金。

陪同记者采访的当地乡镇官员说：“梁稳根发家后为村镇做了很多善事，捐款高达数千万。”记者了解，道童村一条长达 15 公里左右的水泥路及桥梁，是梁稳根捐赠 200 多万修建。竣工

于 2006 年的“三一中学”，也是梁稳根捐资 2000 多万元修建。“据不完全统计，梁稳根为涟源和茅塘镇合计捐赠已超过 6000 万。”上述官员说。

此外，梁稳根的家风甚严，对待亲眷从不宽待迁就。一个著名的小例子是，梁的夫人李立华有一个娘家亲戚因在工作中受气后想调整岗位，请李找梁说情，但遭到拒绝。

[争议]

梁稳根是否应离开企业？

湖南省委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不排除梁稳根转变身份后将按照组织安排在长沙市或湖南省任职从政

如若完成身份转变之后，梁稳根是否会离开打拼了 22 年的三一集团呢？

当前，很多企业家拥有公司负责人和政府行政角色的双重身份，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让外界倍感质疑。这种运作背后的实质，不仅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是为了利用身份资源进行各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权力寻租”。事实上，这种政企不分家的行为在国企与央企中尤甚。

知名财经评论人叶檀得知梁即将转换身份时，她表现更多的是惊讶：“很难想象巴菲特突然成为美国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听起来像是黑色幽默。”叶檀认为，如果梁稳根真如预期那样身份转换，他在企业中的职务应该有所变化。梁可能到来的新身份，无论对三一集团还是对他自身，都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可以预见的是，消息正式公布的当天，三一股价必定大涨。同时，也会提升股票市场的低迷情绪。她指出，梁稳根应退出企业，退出企业家的身份，“梁稳根既不能是原来企业的高管，也不能再持有三一的股票，否则，就无法保证这个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市场公平”。

对此，浦兴祖持相反意见。他表示，个别人的行为不至于影响整体趋势，因此梁稳根没必要退出三一重工集团。他说：“如果梁稳根退出了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反倒无法更好地表达其所在阶层的利益诉求。”

对于梁稳根，外界更多关注的是，他日后将如何处理政企二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和定位。“梁稳根进入的不是行政序列，而是执政党序列。无论他进入哪个序列，他握有权力的手，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因此不管进入哪个序列都应该退出企业。”另一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不愿具名的学者认为。

湖南省委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不排除梁稳根转变身份后将按照组织安排在长沙市或湖南省任职从政。他表示，现在政府里最缺乏这种有大企业管理经验的领导人，梁稳根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2011-9-20 文图均据时代周报）

走近晚年汪东兴

汪东兴，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清湖乡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在家乡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随红十军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参加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曾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等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十年“文革”宣告结束了。鉴于汪东兴的作用和贡献，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可是，随着党和国家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共和国的历史重大转折中，汪东兴的职务和地位发生了逆转。

面对人生的大起伏，汪东兴还是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离开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他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让我们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就一直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与他比邻的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记得我们初次登门是1994年5月。秘书刘桂民年轻精干，他很客气地引导着我们穿过花木葱茏的院落走进客厅，那时年近八十的汪东兴头发已经全白，但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腰杆直挺。

1995年6月，为了拍摄方志敏的专题片，地方电视台进京采访汪东兴，我陪同前往再次见他。在进入正式拍摄前，我有机会与他多聊了一阵子。汪东兴说，毛主席与方志敏在当年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见过面，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他俩虽然没谋面，但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到英勇牺牲的情况主席还是很了解的。毛主席很钦佩方志敏。汪东兴对着采访镜头，将他亲耳听领袖评论方志敏的话说出来……

1953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在浙江省莫干山半腰散步时，对汪说：“爬到山顶就可以看到你们江西弋阳县了。弋阳出了个人民英雄方志敏……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

1965年5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视察井冈山时，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汪东兴与我言谈的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在此之前已形成文稿寄送给家乡党史办了，成为我们最珍贵的文档资料之一。

电视台结束录音录像采访后，还要拍一些汪东兴近期的著作和生活情况。刘秘书和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忙碌着从内室搬来一捧书刊。刘秘书一边翻动那些有汪东兴文章的杂志，一边向我们介绍，近年来找汪老的可多哩！可汪老除了同意与中央部门党史机构的同志联系，其他的人找来都让他挡驾了。

确实，汪东兴是与中国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特殊经历，和粉碎“四人帮”时发挥的作用，使他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位具有独特经历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先后出版了《汪东兴日记》、《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反映了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片段，其新鲜翔实的内容，为读者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专家所瞩目。

我们谈话的客厅宽敞整洁，陈设简单朴素，北墙一排书柜放满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西墙靠窗处挂一中堂，是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其书法笔走龙蛇，骨气雄浑，令人心胸激荡。

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是延安时期的红军队伍中的老医护人员，她见我们在这幅墨宝前驻足凝视良久，便告诉我说：1961年10月16日那天，秋高气爽，毛泽东兴致很高，除了给汪东兴同志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又写了老人家自己的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我们在毛泽东的书法集中，见过这件墨宝的复印件，在场者有人说人民大会堂里也将其放大，挂在大厅，这幅书法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雄风遒劲，气势磅礴，石破天惊，排山倒海，气韵如虹，把作者的博大胸怀、革命气魄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这样珍贵的笔墨赠给汪东兴，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汪东兴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

有他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汪东兴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姚湘娥笑着说：在中南海工作学习时，有的工作人员屁股是尖的，汪老是平的，“他坐得住”。汪东兴告诉我们，那个时期他重点阅读了有关党史毛泽东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回忆和思考相关问题，每当有了想法或理清了思路，马上就动笔写……

他还说，他每天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多半安排在下午。晚上七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七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一小时，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就寝。他说，生活要有规律才好啊。

众所周知，汪东兴对毛泽东特别崇敬。家人告诉我们，汪东兴许多年来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主席诞辰、忌日，他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他的怀念之情。他赠我们的《汪东兴日记》就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100 周年而出版的。

岁月匆匆催人老。如今我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了，可常常听到进京拜访过汪东兴的同志们谈及他，都说年过九旬的他神智尚健，仍保持多年来的习惯，阅读书报、笔耕不辍。我还得知，2009 年 11 月，汪东兴让他的女儿汪小燕代表他参加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联谊会。汪小燕告诉大家，父亲身体健康，也很关心时政新闻，还常常看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资料哩……（摘自《档案春秋》陈家鹦）